

编号_____



()

编印单位_____

材料时间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资料室

一九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20292

152

大学军事资料室

PDG

伟大的战略转变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一…… 1

第一次反“围剿”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二…… 27

第二次反“围剿”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三…… 41

第三次反“围剿”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四…… 53

王明路线进江西和漳州战役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五…… 65

水口战役

——毛主席在江西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六…… 70

6797/35

伟大的战略转变

——毛主席在江西省伟大革命实践回忆材料之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各个阶段都有伟大的杰出的表现。毛主席在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很大一部分革命实践是在江西省境内。这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值得学习。在十年内战中，我虽有大约三年时间幸福地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不过，由于自我革命的觉悟迟，政治水平低，对路线斗争认识很差。因而，当时所知道的事实就不多，理解和记忆的更少，加之事隔多年，回忆模糊，记错了和理解错了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古田会议

一九二九年冬召开的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伟大胜利的一曲凯歌。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的纲领。它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各种错误思想，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建党建军路线，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加强了军中、党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因而，它是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

古田会议前夕，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回来领导红军，是中央的决定，是全军大多数党员和指战员热烈而迫切的要求。毛主席回来后，

立即召集党的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对军中党内的思想情况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才召开古田会议。

毛主席早就指出关于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的必要性，说“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①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②

古田会议胜利闭幕后，毛主席即亲自率领红四军的一、二、三纵队由闽西出发（四纵队留闽西活动）。当时，二纵队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一、三纵队走过后才走，路上得到敌到汀州的情报。为了避免敌军尾追和纠缠，弯路前进。这就是所谓：“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经过“路隘”、“苔滑”的行军，换得避免敌军尾追和纠缠，顺利地“直指武夷山下”。翻过武夷山，进入江西省境。经“广昌路上”、“雪里行军”、“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了赣南活动。古田会议后，各纵队都先后利用时间用各种不同形式进行了古田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在行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部队政治面貌有很大变化。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例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的市场，显然大大缩小。宣传队加强了，“肉刑”废除了。从那时起，在中央红军中，我再没有看到打屁股或打手心的现象。对“逃兵”也不杀了。……红军开到江西行动的本身，也就是贯彻古田会议的实际行动。

在赣南行动，大约四个月。主要是执行红军的“革命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③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打开了广昌永丰（一月）、南康（三月）、

信丰等城，歼灭了地主反动武装，推翻了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赣南红区打成一片。

毛主席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查、改进和丰富已决定的政策。凡有地方党政组织的，都找干部谈话，替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对流氓和对农民武装的策略”等，都作了专门的详细的指示，及时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召开了有名的“二七”会议，把赣南党对于土地革命的工作，引上正确轨道上来。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这就为尔后反“围剿”创造了战场。在亲手缔造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工程中，这种辛勤劳动，艰苦深入调查研究社会情况，是正确路线的保障，是根据地开创初期非常切实而重要的大事。

在这一段时间里，红军曾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施家边干脆地消灭了敌唐云山的一个旅，三千人左右，揭开了打运动战的序幕。施家边战斗的胜利和几个城市的打开，大大地鼓舞了江西、福建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许多人踊跃参军。六月，红四军重新开回闽西，在汀州休息、开会、整编。

（二）汀州整编

毛主席在汀州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在会上，毛主席分析了革命形势，提出了红军向前发展的任务。会议经过颇为激烈的争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终为大多数同志所拥护。

~ 3 ~

汀州会议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第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决定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对红军进行了整编；与此同时对闽西地方工作也作了讨论和决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毛主席历来关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战略后方的巩固。汀州会议做到了“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④这样两方面的兼顾。

整编情况，将红四军的一、二、三纵队扩编为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四纵队和闽西的地方武装，则抽出一部分人员来充实这两个军。红四军是由一、二纵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一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时叫二十八团。此时有三个支队，即三个营。第二纵队原系毕占云率领起义的一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两个支队，即两个营，部队建立较晚，战斗力也稍弱。这样，红四军就有五个支队为基础。

红十二军是由三纵队和军特务营为基础扩编的。第三纵队即前武汉政府警卫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在井冈山时叫三十一团，此时也有三个支队，即三个营。加上四军军部特务营，这样，红十二军有四个支队为基础。

原红四军第四纵队和闽西其它地方武装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即后来的闽西红十二军。

江西地方武装以红二、四团为基础扩编为红三军。

每军各编三个师，师辖三个小团，团一般是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

原红四军军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旋即改为红一军团）指挥部和政治部。统帅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三个军。毛主席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朱云卿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岳斌（后来在五次反“围剿”中投敌，干尽坏事，解放后镇压）。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

红四军军长××，政委罗荣恒同志（原三纵队支队政委）。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政委蔡会文同志（也是原三纵队支队政委这时一起调出），参谋长周子昆同志。

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同志（向江西移动时，伍中豪同志病重留后方，由罗炳辉代理军长。后来我军四师攻吉安时，伍中豪同志在安福附近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的伏击，壮烈牺牲），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野（闻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企图投敌，未遂，自杀）。

红军在汀州开会整编，停留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整编后，毛主席便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从汀州出发向广昌集中，会合红三军（毛主席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略”即指此），正式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旋即改为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一军团这个番号是中央军委给的。当时在党中央军委主持领导工作的有周总理，军委秘书长是聂荣臻同志）。

（三）向南昌推进

一九三〇年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中所预见到的：“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在这革命高潮正要到来的时间，立三路线窃据了中央领导机关，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

议案，下令要一、二、三、四军团（后改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三军团因和一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所以欠第三方面军的番号）分别攻打南昌、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凡是执行这一错误路线的，都在不同情况、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后，先在广昌集中，后在兴国地区集结。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特别是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向赣南闽西行动作战中的经验，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看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拟定了一套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⑤

特别坚持进行运动战，反对阵地战，反对攻城。从一开始就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方针。因而从一开始就抵制了立三路线，在毛主席领导下，红军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大伤亡，而得到发展和壮大。王明路线派进江西红区的先遣队不调查、不研究，不许别人讲话，不听正确的意见，硬要说：

“……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事实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说法。实施上，我们于七月十一日由兴国集结地向樟树推进时只发一个行军计划，后面附有一个行军路线图（这张图用油印套色版绘印的）。在向北推进中，先在永丰县城附近打了一仗，歼灭敌人一股，约二、三百人（或三、四百人），取得了军团成立后初战的胜利，红军进入永丰城。在永丰县城我们才发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在命令中只说“向南昌推进”，并不讲打南昌，更不讲打南昌的什么意义，这是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请那些王明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些事实吧！你们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怎样解释这些事实呢？打下永丰后，再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还有电话等通讯设备，打得比较激烈，但也很快很顺利地全部被我歼灭。接着，继续向樟树前进，七月二十二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

（四）樟树渡江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

抚州地区——一个旅。

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

南昌地区——一个旅（两个团，分散的）。

以上三个旅，都属张辉瓒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军进占永丰，攻下七琴，又继续进逼樟树，

南昌之敌必大为震动，必将急调抚、阜二旅往救。抚州、阜田两处之敌，赶来樟树的距离差不多，阜敌则多隔着条赣江，渡江估计至少须一天多，计算时间，我军进到樟树后，一、二日或二、三日，抚阜之敌，必先后赶至樟树，我军如分别迎击该敌于运动中，也可能各个击破之。而南昌之敌仅戴岳的旅，只有两个团的兵力，且分散各处，不易收拢，即使收拢，在南昌这样大的城市中，一时也难以完成防守工事的构筑。从这些局部的表面的战术上的情况看，先歼灭抚、阜之敌，得手后再相机向南昌进攻，似乎是个好机会。同时，中央下令（立三路线）要红一军团打南昌，我军扩编后士气高昂。这在当时是颇能迷惑一般人的。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动摇伟大领袖的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的最高，看得最远，观察最全面，分析最深刻，从而提出的办法，总是最妥善，最有远见，最英明。

我军一到樟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这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决策，这次会议听说开得比较顺利，时间很短，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转去调查船只，动员船工，收集船只，准备渡江，在樟树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时间虽只三天，收获却很大。七月二十五日，司令部于黄昏时分，就随前委渡过了赣江，在离樟树约十五公里左右的地方宿营（似是一个大庙，记不清是否崇祯观）。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硬说前委放弃了正确路线，冒险去打大城市。请问这些人对于樟树渡江这一行动怎样解释呢？

樟树会议，是又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

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汀州会议是这第一个战略转变中第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樟树会议是第二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抵制了立三路线对红军的危害，使我军沿着毛主席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经过四十年后，实践说明了真理。我们再回顾历史，就不难理解在樟树西渡赣江的战略行动的伟大意义。事实证明，在红军还幼小的时候就去夺取大城市，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夺取了也是守不住的，当时狂热地执行立三路线的彭德怀、张国焘等，无不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教导我们：“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⑥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⑦

当时，政治上的宣传教育工作，毛主席是亲自抓亲口讲的。组织上首先是编足战斗队，机关是非常短小精干的，许多机关缺员很多，但能工作，装备力差，打了胜仗，缴获了许多枪炮，增加了武器的数量，只是通讯器材还很缺乏，特别是没有可用作同党中央直接通讯并同其它地区红军联系的无线电器材。因而这时各地区红军之间缺乏相互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不能协同配合。

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首先必须集中兵力，从建立中央红色革命根据地长远的战略上考虑，当时最必须而可能集中的是三军团。如果在樟树附近迎击敌人，虽然有胜利的可能，但也有许多不利的条件。如：1、战场是白区，缺乏群众援助这一重要条件；2、赶来援救南

昌的抚、阜之敌相距不远，不是孤立无援的；3、我红一军团才编成不久，一起协同打大仗，打连续战斗的经验不多。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在樟树迎敌，不管胜败如何，都将延误同三军团的会合时间。而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三军团会合，统一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充分利用有利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建立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推进革命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才能在以后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打得那么出色。如果不及时会合，让彭德怀、
之流独自抓着红三军团，疯狂地去执行立三路线，对革命的损失，就很难设想了。又如果我们去打南昌，虽然在局部上也可能打胜仗，而结果必然在全局上促使立三路线更嚣张，更难制止，殆害中国革命必将更久更大。

在樟树西渡赣江以后，红军略为向北推进，“示形”于东，作向南昌进攻的姿势，使敌人感受威胁，而迷惑。“八一”前夕，总部进驻新建西山万寿宫。为了纪念南昌起义，我军团各部都开了大小不同的会纪念“八一”起义，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南昌北面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射击示威。八月一日，红一军团即分路沿着安义、奉新西进。十日，总部经上高到万载，路上，在上高县城一个很破旧的教堂里，开了一个直属队干部会，会上，毛主席向总部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政治报告，讲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解释了这次行动的意义，具体讲述了不打南昌而去和三军团会合的道理。黄公略同志也来参加，再听了毛主席的这次讲话（他说：他还要再听一次。黄公略同志对毛主席很尊重，很虚心学习）。这次干部会是毛主席对直属队干部的关怀，是毛主席在这伟大战略转变中，亲自抓政治思想工作，亲自贯彻樟树会议的生动范例。

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八月十八日拂晓，以突然强袭包围消灭之。三军的师长柯武东同志就是在文家市战斗中，向“棺材岭”冲锋时牺牲的。前面已经讲过，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性及其条件。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主席很关心这件事，在打文家市的作战命令中，专门写了注意缴获无线电台并注意保管好的条文，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战后清查，电台被完全破坏了，甚至缴获的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好几箱，也被焚烧了。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消除游击主义，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动，非经过长期深入的动员教育不可。

（五）永和会师

一打下文家市，就了解到红三军团在永和市。伟大领袖毛主席不顾连日行军和计划、组织、指挥作战的疲劳，当天就赶到永和市去会合三军团。

一、三军团永和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毛主席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错误地接受立三路线，坚持在红军幼小的时候进攻中心城市“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行动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别有用心的大军阀、大野心家、反党分子彭德怀，

打着“立三路线”的黑旗，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当时还有人也在总前委会。

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不打南昌，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就是彻头彻尾错误的，是典型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虽然侥幸打开长沙，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三军团虽然突围出来，而被他煽动去的地方武装（听说有一万多人）都来不及撤退，大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结果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报纸上登一条大消息。野心家彭德怀自以为得计，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而不顾错误地多流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

（六）长沙创敌

打长沙，打大城市，攻坚，这同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当时全国政治形势虽然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于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转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三十一个团。我们的兵力实际上只有十三个团（一军团三个军九个师，三军团二个军四个师，共十三个师，实际十三个团。加上后来的十六军实约一个团，也不过十四个团。全方面军也不过十六个团，仍然不到敌军数量的一半）。敌军兵力在数量上多我一倍多，而不是只多一、二个团，而且敌人筑有防御工事，还有

外壕、铁丝网和电网等障碍物。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设备、技术和经验。如果不看清当时革命发展和红军壮大的新形势，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因形势发展就冲昏头脑，连敌人多少兵力（比如长沙城内守敌的数目，这种数量和我军数量的对比是直接规定问题的性质的）也不弄清楚，过分强调敌人困难，夸大自己力量，就会替立三路线和彭德怀野心家辩护，就不能理解毛主席当时领导的英明。

“中央”命令要打，别有用心的彭德怀，**顽固地坚持要打**，而实际情况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所“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开始。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主席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教育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开进”（开进到长沙东南距城约二、三十里，一部分先头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这是毛主席把三军团引上正确轨道的第一步）。王明路线的先遣队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已会合，成立了总前委，毛委员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因而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就是毛主席执行立三路线。这完全是形式逻辑的说法，全不看事实的真象，是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也是别有用心地为尔后排除毛主席的领导作舆论准备。又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主席统一领导的，是正确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他抹煞了当时严重的路线斗争，客观上为彭德怀开脱。

在这过程中，我们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长沙南铁

路线上)出击。当夜我们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三个军(实际兵力九个团)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出击之敌。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彭德怀又大叫起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要改变行动,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没办法,只得留下红三军作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是彭德怀无法反对的),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三军团、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虽也展开进攻,但没有蛮干,损失较小)。

第三天,下午三时许,敌人沿猴子石出击。至五时许,敌人出来两个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军兵力有限(三个团对二个团)并且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一下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落水死者无数,两个团基本上全部被歼,给长沙守敌以重创。三军部队又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人失了一件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传达命令迟缓,不能照命令执行,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还会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彭德怀等又吵着要打长沙,并亲自指挥三军团主力猛攻,企图用“火牛阵”冲破电网。可惜“火牛”一出动,远远冲不到电网跟前,就被敌机枪扫倒,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第二天,只好大家吃牛肉。长沙攻不下,这时,彭德怀自己大概也感到进退两难了。

(七) 回师攻吉

怎么办?怎么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轨道上来呢?

“毛委员有办法！”这是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
有办法，而且有的是最好最妙的办法。

这时，毛主席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先撤离攻击位置，
向东南“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然后再提出回
师东向，攻取吉安的方案。在长沙近郊开了好几次会议（包括白田铺
会议）。这一系列会议，都是一次又一次反立三路线的会议。最后
一次，才决定暂时不打长沙。这样，才把整个方面军从坚城之下撤出，
并从湖南回到了江西。沿途经株洲、醴陵、萍乡、宜春，一边移动，
一边做群众工作，内部再做说服教育工作。

在东移中，路过安源，为了团结彭德怀，毛主席亲自到安源三军
团驻地，专门做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内，毛主席还到安源
山工人那里做了工作（这就是毛主席第八次到安源）。总司令部随后
经过安源东进。总司令部在安源短短两天内动员一百个工人挑了一百
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革命斗争是极
为复杂而曲折。总部已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宜春发出三十日向吉安
前进的命令。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同志的来信，
大意说中央命令部队回去打长沙。总部一面派人去接他，一面通知各
军就地停止待命。大概是当晚（二十九）他就来了。听说他是带着立
三路线的命令来的，要说服毛主席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栗一到
宜春，毛主席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地交谈，谈了两夜一天（或
更多时间）。毛主席把他完全说服了。这位立三路线的代表竟完全放
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并成为
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主席英明。后来就是他在青塘

~15~